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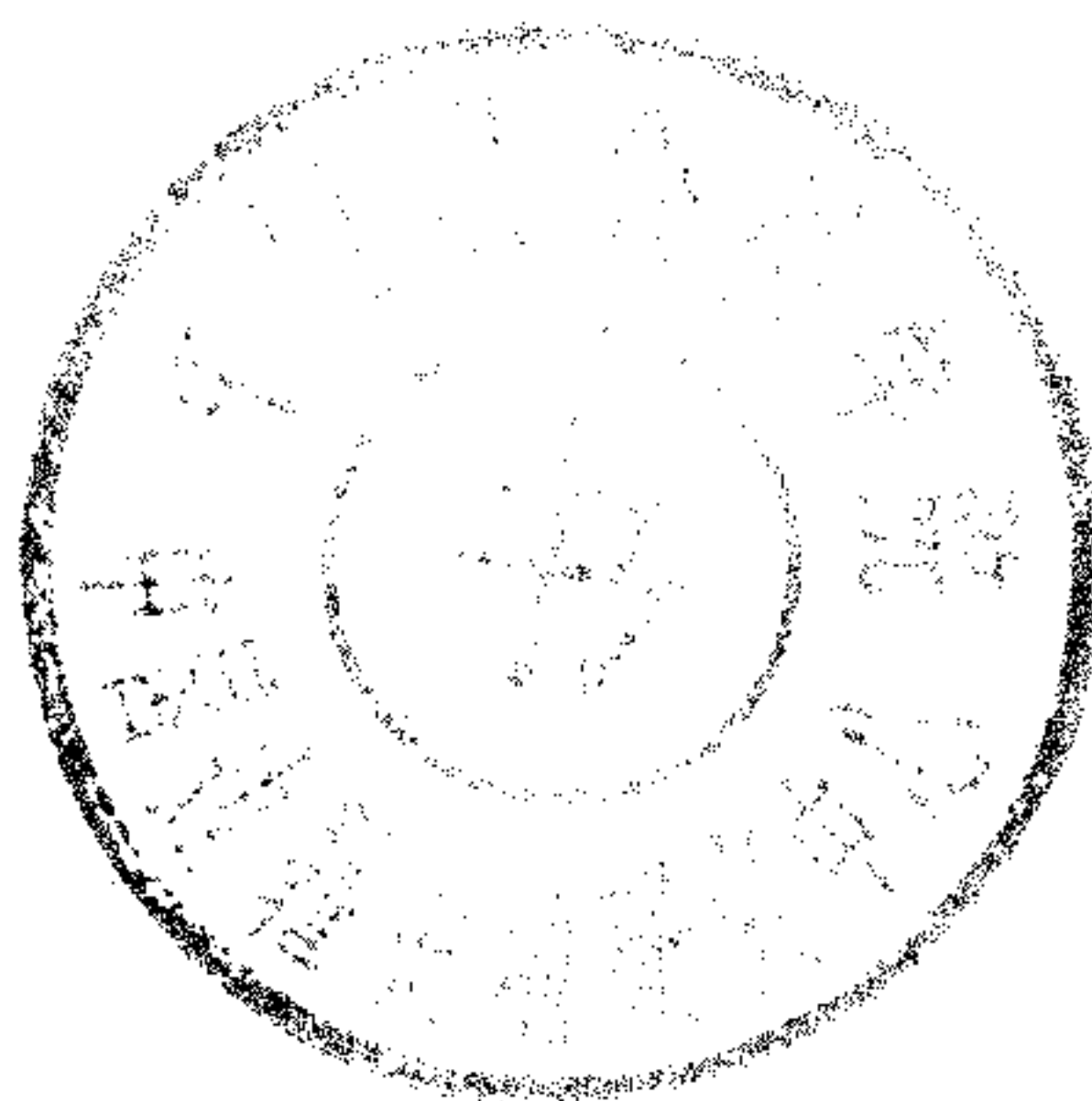
K2951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上海史资料丛刊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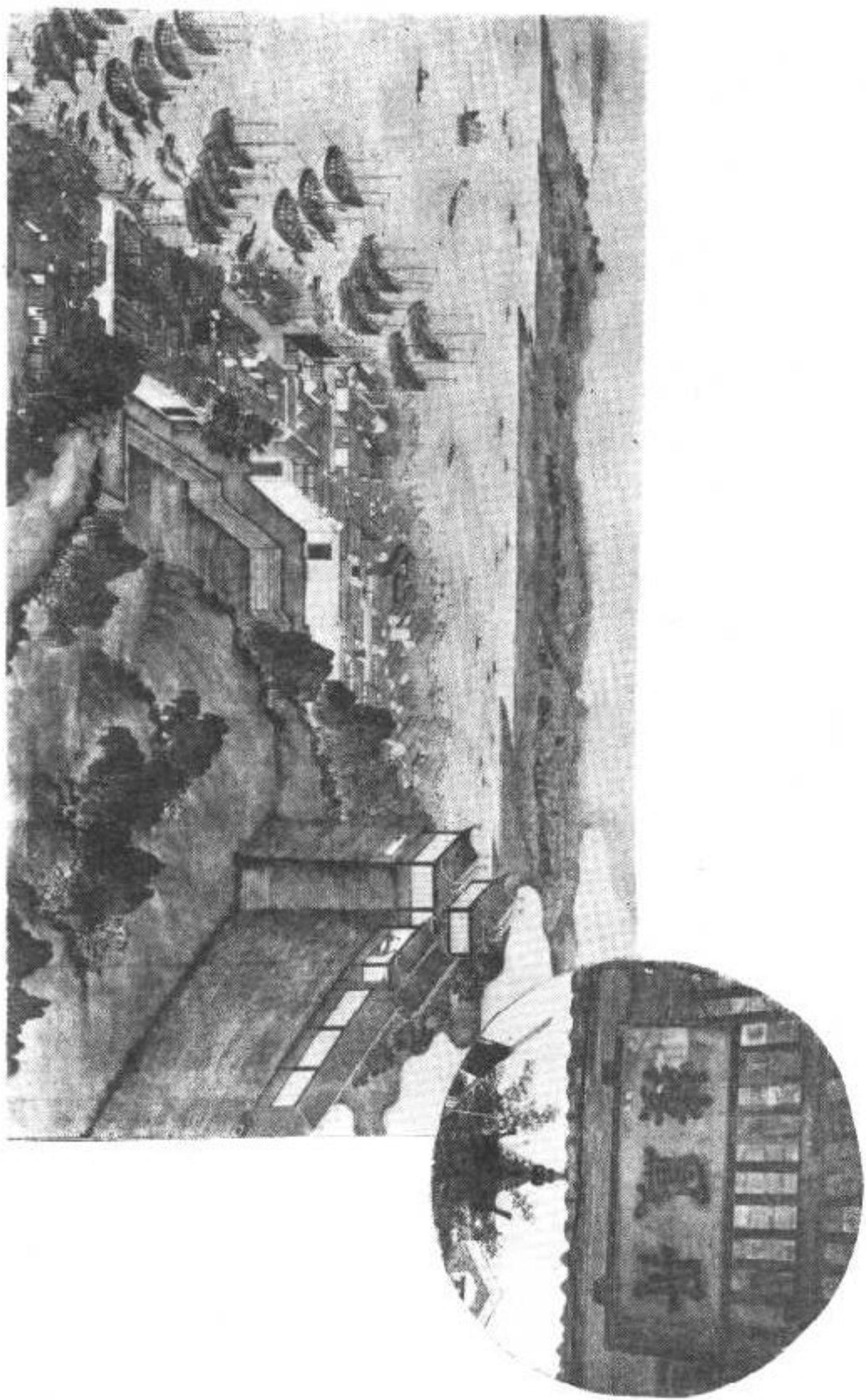
1859

责任编辑 王 有 为
封面装帧 邹 纪 华
封面题字 胡 文 遂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6.75 插页6 字数207,000
1980年6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5,600
书号 11074·409 定价(七)2.0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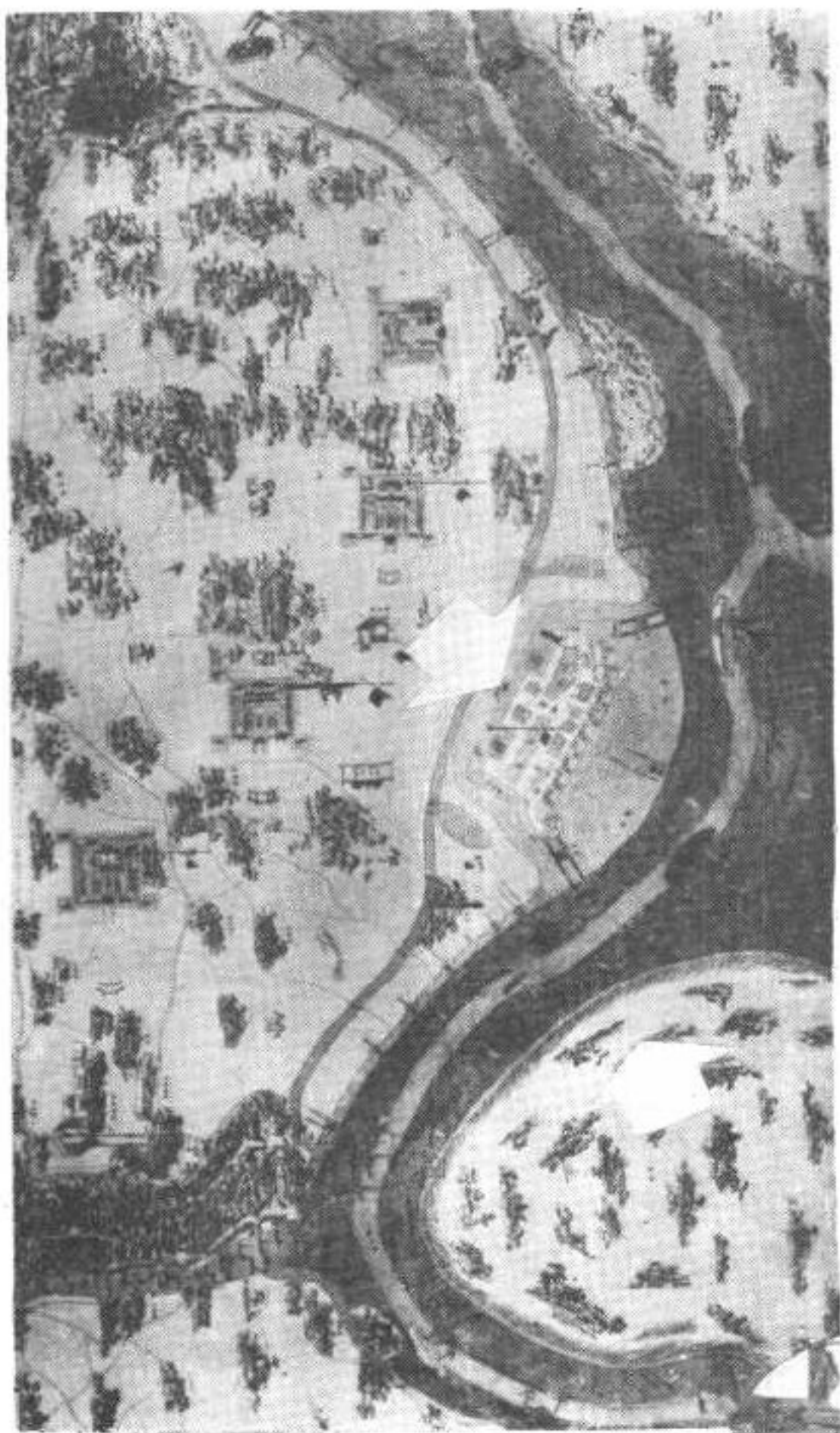
0001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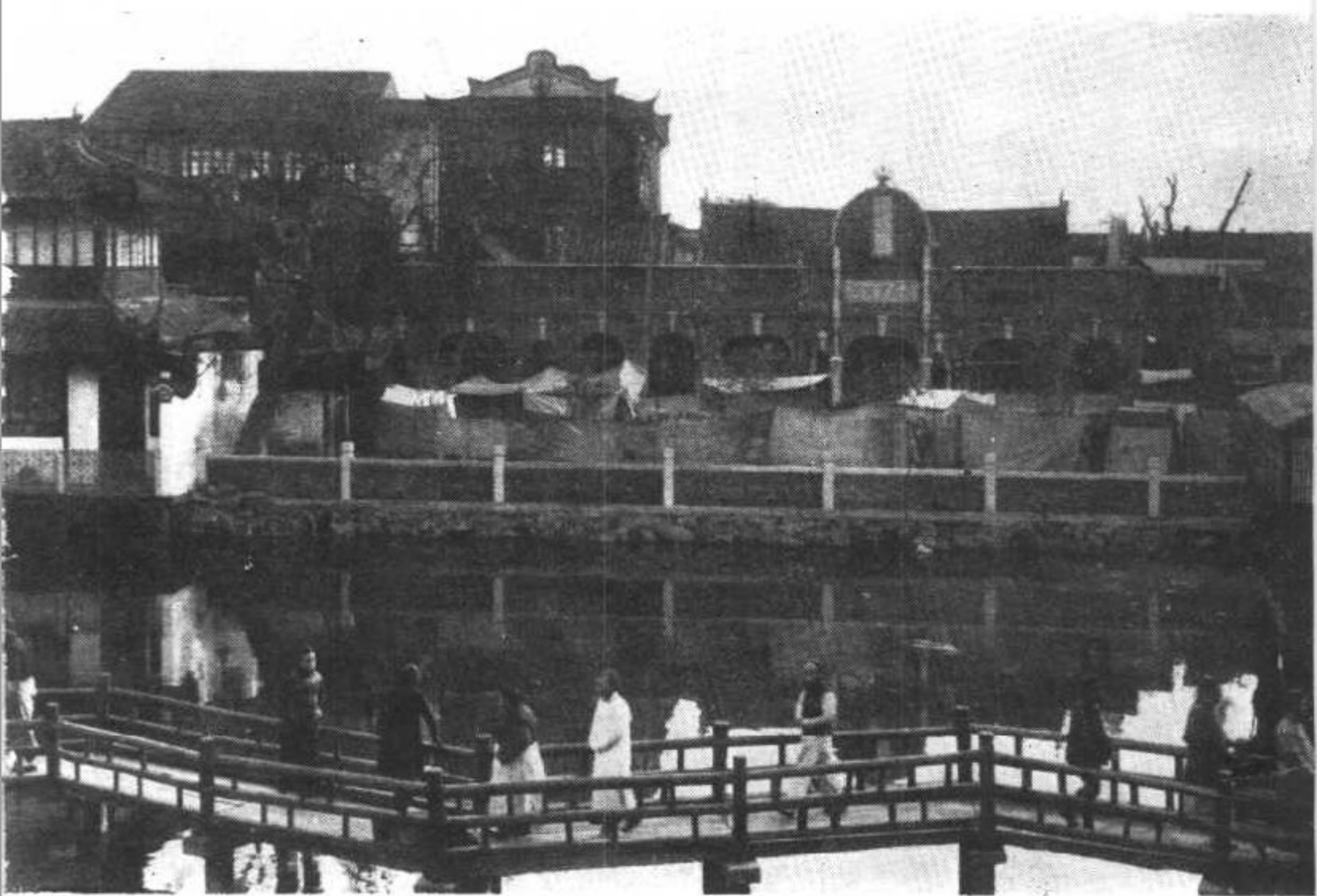
清道光年间画工临摹前人所作丹凤楼图及民国时重修丹凤楼之匾额。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前“畿城东南，舳舻尾街，商舶辐辏”的繁荣景象，从图中可见一斑。



清咸丰七年(1857年)所建上海江海北关关署照片。
早在清康熙年间上海县城已有海关之设,上海开埠后,又
在城外黄浦滩设立新关(北关),专司各国船舶税务。



清光绪年间吴淞形势图及今存之宝山嘴炮台碑照片。鸦片战争时，守将陈化成率吴淞、宝山炮台军士，猛烈夹击英舰，大挫侵略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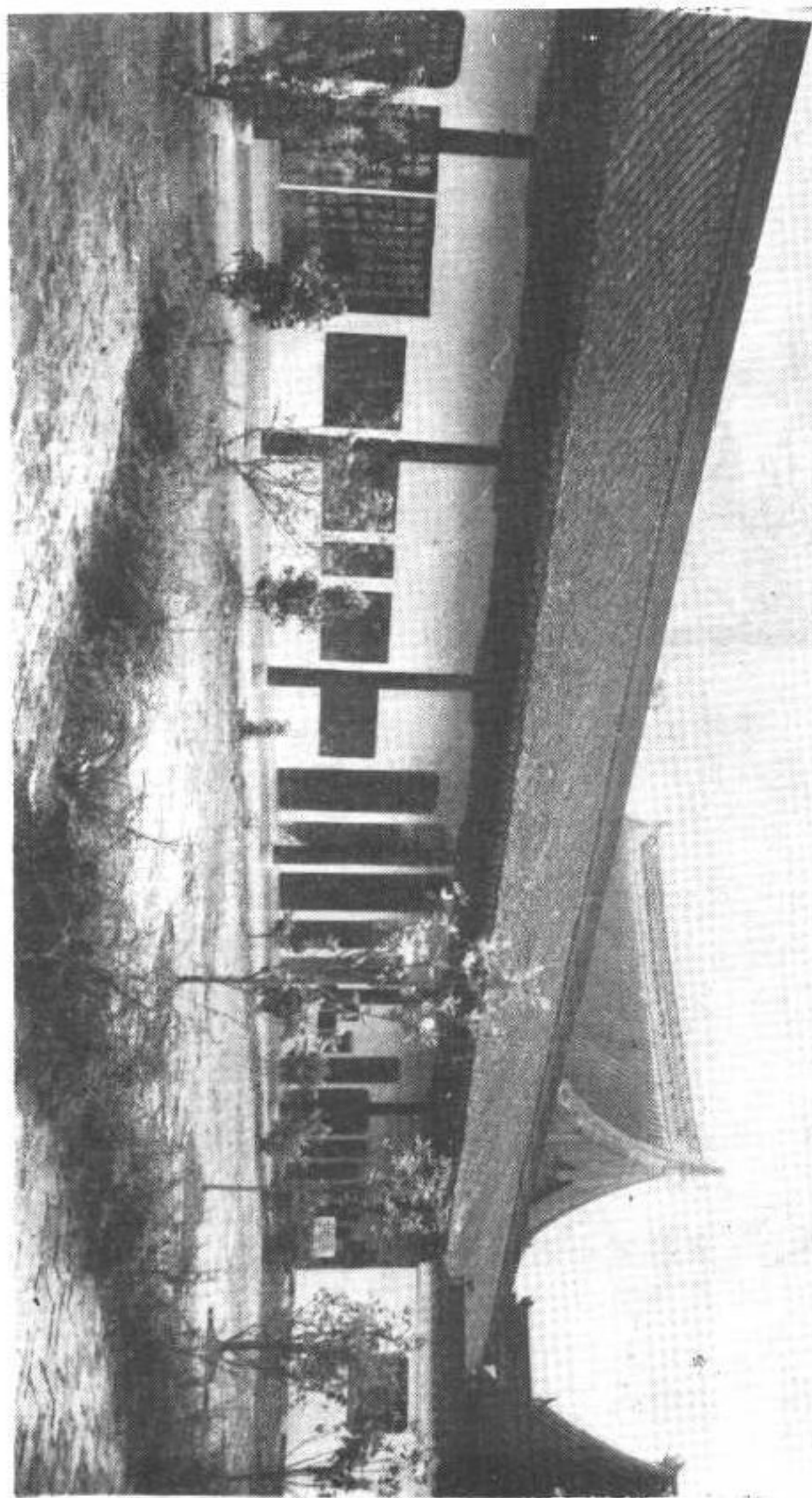
清末上海城隍庙九曲桥照片。上海城隍庙又称邑庙，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经明清历次重修扩建。清乾嘉年间，庙产西园（今豫园）为各商业行会集资建立公所，旧址遗存碑刻很多，反映了城隍庙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清末上海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山西路、山东路之间)街景照片。
南京路俗称大马路,由租界的建立而开辟的。



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
(1715年)的上海商船会馆照
片。该馆系崇明、锡金船主
商号所建,是上海现存最早
的会馆遗址。



嘉定孔庙(今县博物馆)碑廊照片。解放后集中部分流散县内的碑碣，建此碑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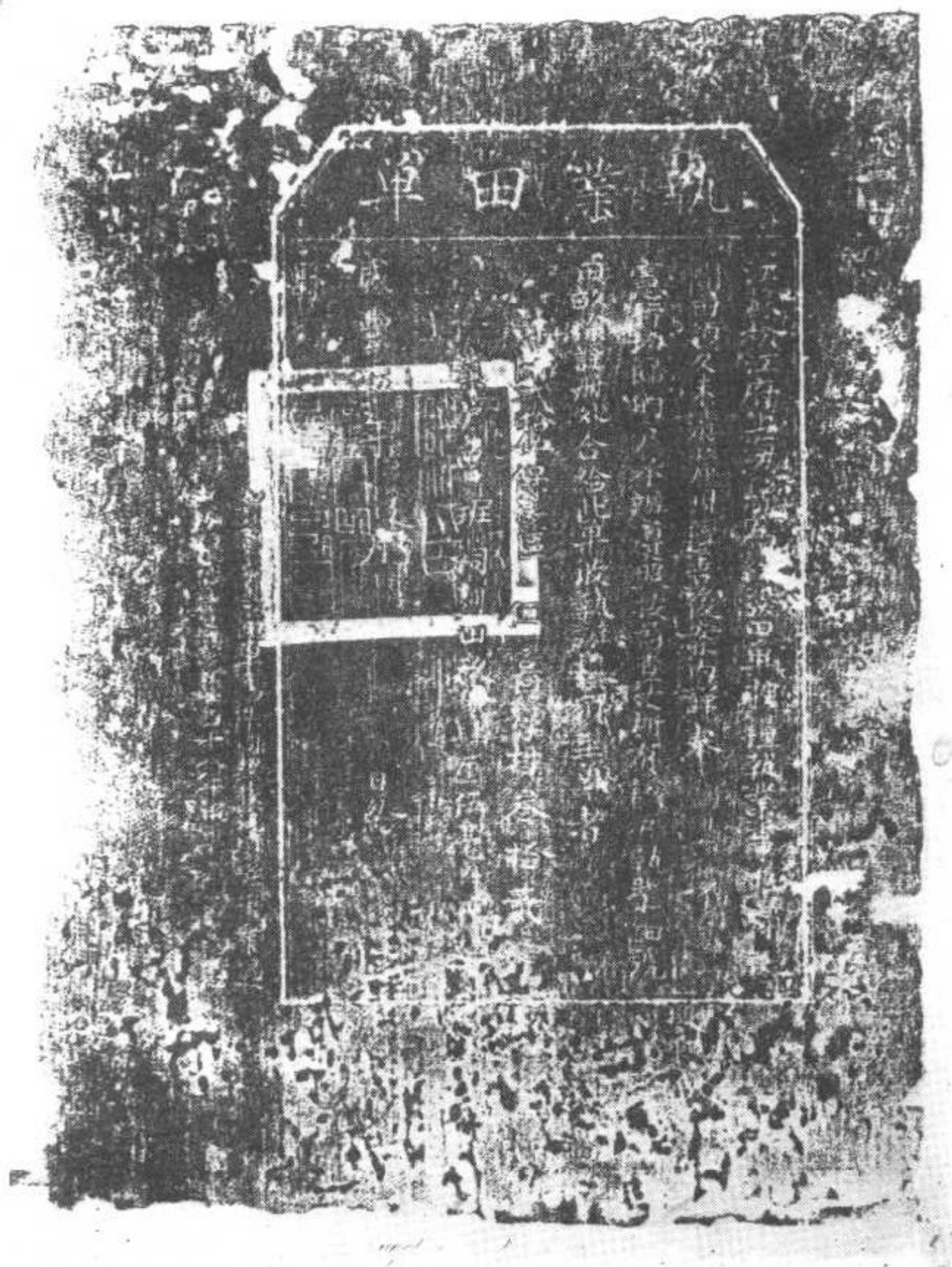


署江蘇松江府上海縣正堂加五級紀卅十歲石

嘉慶捌年拾貳月

日示

嘉庆八年(1803年)松江府上海县为箩夫扛夫议定脚价订定界址告示碑拓照片。



咸丰五年(1855年)松江府上海县发给水木公所鲁班祠的执业田单碑拓照片。

序 言

上海，濒东海、居长江口，扼水路交通要冲，南宋咸淳年间设镇，建市舶提举司，已是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公元一二九一年（元至元二十八年）立县。经明万历到鸦片战争前夕，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遂成为南北洋交通贸易的枢纽，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业城市。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所置江海大关——江南海关，便设在县城小东门内，时四乡的花、布，南北各省的糖、豆等商货，俱在此聚散。艤城东南，舳舻尾衔，商舶辐辏；城外洋行街一带，铺户商号、会馆公所栉比林立，四郊各县市镇丛集、星罗棋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萌芽，业已稀疏地出现，其情况与欧洲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以前的十五、十六世纪时意大利沿海城市极为相似，鲜明地标志着我国社会正向着资本主义社会缓慢地发展。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黄浦江内外外轮趸船游弋自由，外滩和南京路上洋行公司纷纷出现，从倾销商品到输出资本，建工厂、设租界，控制我国海关和行政主权，把上海变成压迫中国民族资本、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侵略基地。上海的近代史，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一步步地把中国社会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缩影。建国以后，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先后两次进行的文物普查工作中，在上海市区和郊县，特别是在上海旧城区——南市、松江和嘉定县的旧府署、城隍庙、文庙、园林、寺院、会馆公所以及市镇等处，发现了许多宋元以来遗存的碑刻，除封建官府颁发的各种禁令、告示之外，还有许多是关于上海的历史沿革、职官、和航运

21101
业、商业、手工业、农业水利、学校、习俗等等。它给我们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原始记录，是这一段历史最珍贵的物证。为了配合我国近代史、上海地方历史的研究，我们特将这批碑刻资料加以整理、选录，编辑出版。

本辑收录碑文二百四十五份，分编为五类：

第一类是上海的历史沿革。共收碑文二十七份，提供的是宋元以来上海的历史沿革与经济发展的有关资料。七百余年前，上海设市舶提举司时的镇市建置规模，可从宋代董楷的《受福亭记》与明代秦嘉楫的《改建丹凤楼记碑》两篇碑文记载中，窥见一斑。公元一四一二年（明永乐十年）的《宝山烽墩碑》所记内容，是当时上海航运事业发展的有力说明，在宝山濒海之墟筑土山，「上建烽墩，昼则举烟，夜则举火」，主要是「以为往来之望」，便于海上的船舶航行。上海城隍庙旧址遗存的碑刻中，关于邑庙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经明万历、清康熙、道光年间历次重修扩建，乾隆年间筑湖心亭，以及捐款人姓氏、捐助金额和用费开支等情况的记载，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城隍庙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因而，雍正九年清政府才将分巡苏松兵备道公廨自苏州移驻此地，以「弹压通洋口岸」。在鸦片战争中，英军侵入长江口时，守将陈化成所指挥的吴淞、宝山炮台军士，猛烈夹击英舰，大挫侵略军。宝山嘴炮台始建于公元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当年炮台筑成时所立的石碑，至今仍矗立在炮台遗址上。此外，市区静安寺、松江唐经幢、嘉定法华塔、白鹤南翔寺（后改名为云翔寺）、青浦金泽的古桥……都是著名的历史古迹，受到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妥善保护。有关的碑刻资料，都是上海地区悠久历史的信物。

第二类是社会经济。共收碑文六十一份，记录了明万历到清末，苏松太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

水利交通，以及上海的航运业、港口码头等历史情况。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曾经指出的那种「产业资本的萌芽早在中世纪已经形成，它存在于以下三个领域：航运业、采矿业、纺织业」的情况，从这一类碑文中，可以找到相当充分的说明。

这里辑录的清代江南海关因商船出入上海港口而颁发的各项告示碑文，都是当时上海航运业历史的真实纪录，从各个方面揭示了从事海上贸易的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的经济地位和相互关系。从这些碑文的记载中得知，当时来自闽、广以及关山东等地的商船主，如公元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的福建商船主金永安、金庆春等七户、金晋德等四十户，有的拥有洋船，有的拥有沙船。据史籍记载，大小船只使用的舵水人等，各达十余人至二十六七人不等，「悉系雇用贫民」，船主与舵水人等之间的雇佣关系，被分红的组合形式掩盖着；码头上，还有一批专门从事扛抬商货的扛夫、箩夫，是由商号「随便雇用」的，扛夫扛抬烟、糖、棉花及一切洋货的脚价都有「详定数目」，由商号「如数给发」；还有驮载货物的渡船，也是「听商民随便雇用」的，等等。在这里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形成的开端。同时，关于商船入港必须「择牙报税」，出口则须「具舱单请验给牌」，应完货税又必须「将钱交牙易银代缴」，牙行乘商船挂号、报税之机，「留难措索」，进行盘剥的情况。所记翔实而具体，增加了我们对封建社会末期，一种新生的生产关系怎样在封建经济内部孕育成长，两者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辩证关系的感性认识。

封建官府为商业、手工业所颁布的禁约告示碑文，涉及盐、布、米、茶、竹木、桐油、靛青、苧麻等许多商业行业和棉纺、棉织、染、踹等手工业部门。使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中，商品生产的范围在逐步扩大，进入交易的商品种类在逐步增多；南方来的闽粤商人「皆载棉花回」，「城市红女悉力纺纱、售之

乡民」，而棉花的销路已遍及南北各省，并运销国外，乾隆年间在上海发卖青蓝布的商号，已达二十三家，个别的商号如张辅臣，自乾隆三十二年至四十九年的十八年中，经售的棉布按每包捐银三分计，总共捐数达九百五十两；还有数十家布商是「布店在松（江），发卖在苏」的，棉布商品交易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同时又看到，官盐和私盐、官布与商布、官牙与商号之间的矛盾交织，以及在商业部门中的当官、承值等各种盘剥名色，对商业资本发展的压抑和阻碍。值得注意的是，部份碑文所记布商与踹布工匠的关系，枫泾、南翔等镇的踹匠是由官府飭令「布坊管束」的，「踹坊工价钱串」是依布商程怡亭等号的呈请，由官府核定的，以及踹布工匠「持众告增，要求增加踹布工价」甚至「聚众抄抢」遭到官府镇压的一种新社会矛盾的出现，反映了商业资本正在突破封建制度的桎梏，向产业资本转化，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情景，为我们深入了解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商业资本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起步、向工业资本转化的实况，提供了丰富和典型的论证。

农业田赋方面的碑文，大都可以与方志记载相印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关于明万历年间实行「漕粮改折」，清初实行奖励垦荒，发展生产政策的记载，在《嘉定县改折漕粮本末记》碑中，所说嘉定「地不产米，止宜木棉，民必以花成布，以布贸粮，以银籴米」的现象，正说明了当时农业生产部门中，业已出现了产品商品化的巨大变革，封建的自然经济瓦解的过程开始了，「漕粮改折」便是这种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公元一八二九年（道光九年）重浚吴淞江时，陶澍等人的奏疏和谕旨刻石，记载当时工程的规模、用费、奖惩以及照「业食佃力之例，劝谕绅耆董办」兴工的情况甚详，是水利交通方面的碑文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份。

第三类是会馆、公所。选辑了清代上海的五十六个会馆、公所的碑文共一百一十七份，记载了关于会馆、公所的创建、沿革、同业共同议定的条规，各业按运售货物总数抽收厘金、历次修缮的经费收入支出细目、捐输人姓名和金额，购置地产建殿造宇，历届董事、司年名单，以及与封建官府的依存和矛盾关系等等情况，生动地揭示了鸦片战争前后两个阶段上会馆、公所的性质、作用和组织形式的发展与变化，对于研究我国近代社会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丰实的原始资料。

会馆公所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手工业者、商人的行会组织。它是在封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并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而趋于消亡的。根据我们的调查统计，有清一代上海先后出现的会馆、公所，共约有百余个，为了便于检阅和对照，特编制《清代上海主要会馆、公所一览表》附于书后，这些碑文记载的会馆、公所，与各行业刊发的历年征信录资料相结合，可以完整地勾划出上海会馆、公所演变的历史概貌，不仅是上海会馆、公所本身的历史档案纪录，而且是反映我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的重要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在上海开埠以前出现的二十余个会馆、公所中，从碑文中可以找到依据的占十八个，而且比较确切的记述了它们的创建起因和年代，补正了志书记载的阙误。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上海作为一个因海上贸易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在鸦片战争以前商业资本的活跃、财富在少数人手里不断积累、以及一个特殊的阶级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而鸦片战争以后，一些新的会馆、公所，如洋货公所、洋布公所、靛青公所随着洋货的倾售而出现，丝业会馆、茶业公所、油麻公所随着外国资本掠夺我国资源范围的扩大而兴起；另一些会馆、公所，如商船会馆、青蓝布公所等，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而趋于衰落。这种会馆、公所的兴衰史，各行的整顿旧规条、厘订新行规，同乡商业、手工业行会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大量按籍贯结合的同乡会的出现，以及它们与封

建势力、外国资本的联系和矛盾等等，从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帝国主义侵入后所引起的一系列影响和变化，都可以从这些碑文中找到。此外，这里还辑录了七份碑文，都是与外国侵略者有关的，部份是上海人民反对法帝越界筑路、侵占四明公所、潮州会馆公地的斗争过程中，清政府与法总领事颁布的公告，提供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镇压人民斗争的实例。

第四类是社会治安，包括封建官府颁布的关于「脚夫」、「流丐」及地方习俗等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方面的飭禁告示碑文十八份。脚夫原系民间婚丧时雇用的短工，脚价向有定议，「听本家自行雇用」，碑文所记脚夫「于桥头巷口设立公所，其为首之人名曰盘头」，以及在为商店铺户搬运货物中，「倘不遂其所欲，则货抛河下」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说明新的社会矛盾在镇市的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出现。至于所谓「流丐」、「成群作队、沿乡强讨」的记载，自道光初至同治末，延续达五十余年，自新庙、安亭、诸翟等镇，扩展至青浦县华亭乡各图，愈延愈烈，当然是封建社会末期因自然经济瓦解、农民破产而产生的现象，尽管封建官府设有「丐头」管束，在上海城隍庙内并设「花神楼丐头」组织，一再「立碑严禁」，仍然无济于事，是不言而喻的。

第五类是封建学校。辑录了嘉定、松江和上海三县宋元以来历代县学的碑文二十份。历代封建王朝都以「设学校以导民性」作为「王政之本」，如公元一二一七年（宋嘉定十年）设嘉定县建置后，不二年即在该县兴建了儒学，便是一例。碑文所记历代豪绅富户捐款、县令撰记、教谕、训导、生员等刻石留名，以及明伦堂、崇德堂、泮池的筹工兴修，计材、占田、蠲赋等情况，都为研究封建教育和地方学校历史提供了原始资料。而光绪年间兴建的上海梅溪书院，增设有洋文课程，聘请通晓西学之人才任教，则是鸦片战争后社会变化在教育方面的反映。